

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 继往开来的十年之路

□本报记者 明江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山西大学文学院、辽金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太原召开。自2004年在成都举办首届论坛以来,《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先后与南宁、西宁、桂林、昆明、乌鲁木齐、喀什、赤峰等地的高校、文联和作家协会等组织机构合作,召开了10届论坛,与会人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的专家、学者、作家1000余人。

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自创建之初,就以跨学科的视角,自觉地跨越边界、填平鸿沟,力图打破文学研究各个领域存在的画地为牢、闭关自守的局面,试图让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走出民族院校、边疆地区,成为一种文化与文学常识。经过10年来的努力和推进,可以说,已经部分达到了预期目标。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已经成为了解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窗口,构成了观察新世纪以来民族文学研究格局的一个节点。

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议题

本届论坛议题共三项:“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10年来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比较性议题与个案研究”,“辽宋金元各族群文学的互动交流”。与会者结合自己的创作、研究实践,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看法。

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需要作家、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梳理民族文学发展的历程。徐建新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关键词和概念入手,探讨了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中常见范式的成就与不足。他认为,在古今相连的多民族交往互动中,应该提倡历史关照下的学科对话互补,而本次论坛与辽金文学学会的合作,是试图沟通古典文学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种努力,这种尝试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向其他兄弟学科扩展。李晓峰就“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是基于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文学被忽视或者边缘化的现实,但最终目的并不是要编写一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虽然这也很重要),而是要确立一种中国文学由多民族作家共同创造、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文学史观。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开始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程中来思考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地位,这将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走向产生影响。刘大先则从自己的具体研究体验入手,讨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读与理论命题的生产”。他认为,对195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代表性作品的重新解读,可以生发出具有中国意义的理论生长点,尤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路走来道路,它们提供了文学的镜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囿于种种历史与观念原因,固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处境,不过它却具有在知识储备上的优势,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必须突破主流文学研究的知识与话语系统,而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视角。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一直是民族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层面,在本次论坛上,与会者就如何更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的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家民谈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文艺思想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研究的内容可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少数民族现代文艺批评、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以及具体的文艺作品等四个方面;研究方法上,除一般性的综合研究外,要特别重视“历史还原”与“从事出发的研究方式”。这些研究对创建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为当代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提供借鉴以及突破以往研究误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余红艳认为,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考察过程。文学关系随时而变,它反映时代语境,反映民族关系。文学关系有时又超越了时代、民族和人际关系,有其自在的关系网络,推动良好文学关系的建立,促进文学关系的健康发展,将有助于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改变。因而,文学关系研究是多民族国家必须予以重视的。此外,史芸芸的《民族文学政策的古今比较》、向虹瑾的《文学与认同:以国歌为例》、李国太的《西南山地民族创世神话中“同根”母题比较与互证》、涂鸿文的《世界语境背景下的独语与对话》等论文,以独特的角度对民族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于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多位与会者着重分析了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关纪新在题为《自我·汉族·中华——清代满人文学书写之一得》的发言中回顾了清朝以来满族文学的历史进程。他谈到,清代满族文学是一份备忘录,提示各个族群只有在具备包容精神的民族体制当中,才有向心的凝聚趋势。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化史观,既不科学,也不利于现时中国的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除了清朝,其他朝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得到了关注。这些研究因为引入民族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也饶有新意,如冯淑然的《民族学视角下唐诗中的辽西意象解读》、李小凤的《江南文化与中国唐代回鹘国家族象研究》、贾一心的《〈阿门之歌〉的文本解读》、吴刚的《辽朝正统观念与多民族文学发展》、于东新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文学文本》等。

在现阶段,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联系得更加紧密,所以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两者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互相参照。杜国景认为,少数民族作家群的特殊性,不只是在题材风格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异族的或异域的情调,而是必须在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有对民族性的认同,有对本民族语言、风俗及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的系统特征的认同。同属一个民族的作家,有可能是跨区域、跨地域的,而这些作家即使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所擅长

的文学形式不同,作品倾向、风格不同,但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性或共同的文化内涵,也同样具有“群”或“派”的意义,而这样的“群”或“派”,与汉族作家的群、派并不一样。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群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上,而要从民族史、文化史,或政治史、国家史等高度着眼。杨彬谈到,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写作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在政治写作中展示少数民族风情风俗,在文化书写中挖掘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在现代书写中表现少数民族独特思维,保持民族特色与文化平等的共同追求。邱婧则关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认为近年来的彝族汉语诗人,担负着民族精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彝族文学和彝族社会起着重要的文化导向的作用。另外,孟庆澍的《解读“小资”文学的兴起——以金仁顺的空间政治学为基础》、周尚肖的《试论金仁顺的民族性:游牧在边缘中的成熟》、罗宗宇的《从〈夏天糖〉看田耳对沈从文写作传统的疏离》等论文则探讨了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创作上的思想艺术特点。

在族别文学研究方面,藏族文学研究成为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钟进文谈到,过去100余年间,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原社会和以藏文化为代表的边疆社会二者过渡地带的青藏高原边缘,形成了一个两种社会和政治制度类型彼此遭遇和混杂、两种知识体系相互接触的“藏边社会”。唐红梅认为,藏区是一个行政和文化概念,其独特的地理人文特征使得它呈现出文化上的一体性。此外,刘玲娣的《茶马古道:汉藏民族团结铸就的“天路”》、吴道毅的《阿来小说创作与藏口头传统学》、樊义红的《阿来的民族文学观》、杨宇宁的《阿族民歌传承发展的现状与困境》、晁正蓉的《维吾尔文情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析》等也都各具特色。

十届论坛回眸

回顾论坛的10年之路,可以看出,每一届论坛议题的变化,都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最开始问题的提出,到概念的倡导,到新的思索,10届论坛收获颇丰,其中的理论成果和对学术著作出版的推动,更是让人欣慰。

在首届论坛上,论坛的发起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关纪新、汤晓青、徐新建等学者对既往民族文学理论建设的得失进行了探讨与总结,他们认为,相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发展,相应的理论概括与理论探讨迫在眉睫。第一届论坛的论题共7项,被归纳为“概念、现状与批评”,“作家、时代与使命”,“理论、比较与兼容”3个方面,都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的热点。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重新把握,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批评框架和话语系统匮乏、缺少多重知识结构的融会贯通、批评范式的缺失、情感关注与身份基点的迷惘、与外来理论对接的不足等问题有了清醒认识。论坛实施“圆桌会议”的形式,为学者们提供畅所欲言、激烈争论场地。与会者来自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学等具体学科,不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相互启迪。而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对于民族母语创作的得失和发展前景的探讨也颇有意义。

第二届论坛议题包括“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批评及其学科理论探讨”,“民族作家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多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等板块。关于民族国家体制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起源和本质的反思,是探讨得较为深入的话题。大家对权力和知识的互动关系予以探索,体现出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自觉。由掌握本民族语言又掌握汉语的不同民族研究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双语写作问题加以分析,倡导以多元文化的理念搭建对母语文学的关注与平等对话的平台,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第三届论坛集中在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确立。学者们对它具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也开始在各自研究或理论探索中体现出自己的学术追求。第一届论坛提出“重写文学史”话题,主要是观念上的沟通;第二届关于学科建设的反思,已经在理论层面进行梳理和挖掘;第三届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研讨,则带有更强的实践性。

第四届论坛主题是“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并设置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系下的民族母语写作”等具体议题。与会者谈到,中国文化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元一体”的历史,中华文学史自然也应当是多民族以多语种、多样式、多风格、多种精神传统共同创造的文学史的有机整合。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的研究与撰写,对推动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互益共生从而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第五届论坛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公共性意义”,“少数民族文学个案研究与理论升华”等议题引起热烈讨论。对各民族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多重阐述,使本届论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进一步深化,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具体化的个案研究诉求,并从人类学、艺术学、比较文学等角度展开对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传统的断裂与继承、民族性与现代性、交流与融通,这些民族文学的重要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来自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从鲜活的批评现场提供了颇具可行性的思路,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借鉴与批判、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意识问题、民族志书写的

观照、少数民族母语写作与翻译等问题,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第六届论坛上,与会者继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行探讨,分析其认同一体性与文化多元性。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化的翻译与沟通、各民族文学关系及相互理解、边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各民族作家群研究等问题都得到大家的关注。本次论坛还讨论了“多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提出民族文学文本的民族志价值及其研究方法,大家还就民族文学多重创作视野、创作目标的问题进行交流。

第七届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国内综合性高校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们参加,并将“论坛”议题挪移到一个特殊的层面,即“如何在综合性高校推进中华多民族文学教学”。随着学界近年来的观念嬗变,这个话题已经愈来愈为身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一线的老师所关注和思索。

第八届论坛主要包括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文化认同与身份问题”。鉴于现代民族身份及其文化选择的复杂性,文化认同与身份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文学领域中越来越突显其重要性。与会者主要从具体文本解读、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等层面探讨相关问题。第二个议题是“多民族史观的发出、发展和展望”,主要从整体性建构、政治文化性建构和历史民族语境建构等方面进行讨论。第三个议题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空间’话语”,讨论了整体性“空间”话语研究、地理性“空间”话语研究、历史性“空间”话语研究和民族性“空间”话语研究等问题。

第九届论坛主题为“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体分三个议题,即“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学:多民族国家的文学表述问题”,“民族书写:如何看待作家文学与民间传统”,“新疆多民族文学研究及评论”。

回顾论坛的10年发展,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4年到2006年,是论坛的草创期。所谓“鸾其鸣矣,求其友声”,主要是突破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囿于学科的界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民族文学进行研究,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重新打造一种符合少数民族文学时代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姚新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文学与边缘区域及少数民族文化关系研究”,关纪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均可视为此期的成果。

第二阶段是从2007年到2010年,是论坛的发展期。经过几年的积累,大家形成了更多的共识,逐渐从国家学的角度谈论少数民族文学,讨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话题,紧接着《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开辟“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专栏,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撰文阐述相关观点。如同关纪新所言,之所以要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因为当下的时代与当下的学界需要这样一种观念来支撑与完备自己的思维。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础、丰富科学理念。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上。这既是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可能需要通过长久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他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积极沟通的重要性。他呼吁研究者应当走出去,介绍民族文学研究成就,宣扬古往今来兄弟民族的文学业绩。同时,民族文学界也该注意防止固步自封。在2009年的桂林会议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普遍开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文化课程的过程中,国内综合性高等院校的本科阶段的中文专业也应当普遍开设中华多民族文学的课程。相关成果还有李晓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姚新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转型期‘民族文学’与‘文化民族主义’”。

第三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3年,是论坛的收获期,议题主要转向多民族文学理论的转型。相关理论成果有:徐新建领衔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王佑夫领衔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文库”编纂与研究、刘大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族文书面文学的现代性研究(1840—1949)”、李骞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研究”等。另外,李晓峰、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刘大先撰写的《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理论著作也都相继出版。可以看到,经过数年的沉淀,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收获了更为丰硕的果实。

这其中,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多民族文学”的提法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提法的一种突破,体现了跨学科视野下对多样性的民族、语言、历史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实现古今、中与西、文学与生活之间勾连的企图。与会者从故事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种角度论述了作为“中国文学”之“多民族文学”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性和当代性,是构建和谐中国、统一中国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第十届论坛上,张杰运用文献计量学原理,从载文数量、栏目设置、作者民族及地域分布、引文数量及类型等角度,对《民族文学研究》从1983年至2012年这30年间所刊载的131期论文进行定量的统计与分析,为今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参考。研究表明,《民族文学研究》取得多方面成就,但如何打破目前整个研究范式依然存在整体性的陈旧局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论坛下一步该如何走,中国民族文学研究如何继往开来,如何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利用新材料和域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际,提炼出符合本国民族文学实际的研究范式,是所有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本文资料对刘大先先生提供)

近日在橘子洲头层林尽染的长沙,为来自遥远的新疆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到会的评论者多是楚人,对阿斯木带来的新疆故事及语言感到分外新奇。主持者则是湖南作协主席唐浩明,他操着一口湘味十足的普通话,从头至尾洋溢着饱满的激情。事后大家都觉得,这位知名的小说家,因为主持这个带有诗性的作品研讨会而化作了一位诗人,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会议。阿拉提·阿斯木带来的新疆诗意,留在了与会者的心里。

从小学习汉语的阿拉提·阿斯木出生于新疆伊犁,这一代人幽默乐观,爱说笑话。有专家认为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以及社会生活中,讲笑话是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他们称之为“恰克恰克”。伊犁笑话流传甚多,十分形象地体现了维吾尔族人的性格、社会形态及其生活习俗。有个笑话说,有一个维吾尔族胖大妈在路边等车,坐上了巴郎子(小伙)拉煤的卡车,巴郎子后忘了大妈在车后,一按扭,车就自动把煤翻下来了。巴郎子突然想起大妈,赶紧跑到车后,大妈却从煤堆里爬出来说:“哎!小伙子,不好意思哦,太胖了嘛,车都给你压扁掉了!”这个善意的,还有讽刺的,说一个外地人在一个馆子里吃饭,要了一碗3元的汤饭,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块化掉的抹布丝,于是质问老板娘:“同志啊,我花3块钱吃饭,怎么在你的饭里吃出来一块抹布?”老板娘不屑地说:“3块钱嘛,你还想吃出来个金丝绒的吗?”阿斯木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用他的话说,“我们那里嘛,只要一开口就会说笑话,劳动、聚会、喝酒时,张口就来”。

他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便体现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幽默深邃,充满哲理和诗性,他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智慧融进了汉语的表达,以一种独特自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一个叫艾莎莎利的男人在开掘玉石中获得了财富,但却心存贪婪和残忍,与对手结下冤仇,逃往上海之后改变容颜再度回到新疆,与熟悉的人们朝夕相处,如同隐身人一样观看朋友、亲人、仇敌等各种人的嘴脸,后来再次挽回真面目,在善良的母亲及哲人的教诲下,弃恶扬善,自我救赎,得以重生。

这部书的出版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稿由汉族作家董立勃推荐给责编周昌义。董立勃在新疆作协工作多年,向外介绍当地作家作品这一类的事情他做了无数次,但这回作品不仅顺利出版,而且跨越千山万水在长沙举办研讨会,由大家南腔北调地点评,却是第一次。这种跨地域的作品欣赏凸显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凸显了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言的丰富作用,同时给读者描述了一个全新的新疆,表达了维吾尔族人的文化传统和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表达了西部伊斯兰文化熏染下的民族心理,以及对财富、爱情、友谊、仇恨等人生价值的判断。

这些充满诗意的表达自然流淌于书中人物的对话或作家的自白。主人公的母亲,一位善良平凡的女性对儿子复仇的告诫是:“你们要忘记、停止复仇的事情,我们古老的说法是,冤仇不能超过40天。……我不愿继续冤结冤、仇结仇。我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和谐温馨的小路,这是我的财富,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孩子们。生命看似短暂,实际上那是一条代我连接的命,我懂这个秘密,尊重这个秘密。”一个民间的交易人说:“他人是我的阴凉,是我的饭碗,是我的笑声。”理发师的小老板观察那些因金钱而痛苦的人嘴脸发黑,嘴唇像毛驴的屁股眼儿那样丑陋,感慨道:“贪婪的人,一生都不能安宁。琴手的歌唱里,爱情是生活的引子。他歌唱大地的希望:你不会有自己的山峦吗?山里有你的情人吗?山上有皑皑的白雪吗?有能融化那些雪山的男人吗?”

阿斯木的写作来自对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来自于对现代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借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过多部小说,但写得有些拘谨,他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放开文学的翅膀,找到一种舒展表达的方式。近几年来,他读书、思考、交流,通过《时间悄悄的嘴脸》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叙事,而更多地进入人物的心灵,常常将人物从生活的小环境里提升到天地自然万物之间,在他采用大量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又常常超越现实,人物灵魂与自然的灵气相汇合,产生对话。夜晚会因为人的觉醒而静寂,天上的星星会成为琴手的歌唱而感动流泪,雄鹰会为飞越天山深处吐出七颗蓝宝石,以感谢歌手发自灵魂深处的歌声。阿斯木笔下的动物也都是通人性的,高大亲切的枣红马,看人的时候眼睛里什么意思都有,人期盼的眼睛它们都懂。于田最好的双峰驼,看人的时候,眼睛像年迈的爷爷的眼睛那样慈祥可爱。还有神秘的沙漠腹地,碧绿的胡杨,坚韧挺拔,象征千年的生命和人气,沙漠里的无数个湖泊,有着黑亮的野鱼,千年繁衍,与人相伴。主人公与露珠的对话,实际上是在自我忏悔,他在梦中会想到天能看得见天,天能看得见人吗?露珠的回答是:天怎么能看不见人呢?天甚至能看得见蚂蚁的心。阿斯木将他生活的种种感悟赋予人物,我们从中学到了维吾尔族人在今天对生活的感受、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别具一格的目光加深了读者对善善恶恶丑的认知。

在他的小说里,还有大量对维吾尔族民俗、饮食、礼仪等方面的描写。很多都是最原始的做法,比如从火灰里扒出来的红彤彤的烤包子,金黄的手抓饭,朴素却让人回味无穷的皮牙子(凉拌菜)。维吾尔族的婚礼、市井中的烟火也写得生动有趣。他的描写别出心裁,高速路像女人一样可爱,而女人的美丽则像民间神话里的神镜,汉人会说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而维吾尔族人说“有钱戈壁滩上也能找到肉汤”。读着阿斯木的小说,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感到耳目一新,他带给我们的阅读超出了习惯的经验,有着十分独特的审美意趣。

在新疆还流传着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说有个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得很不幸,他学过画画,又跟一个商人学习做生意,后来遇到了一个哲学家,觉得悟透了人生的道理,那就是这一切最终都会被死神一笔勾销。他认识到死才是伟大的、永恒的,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短暂的。于是他去寻找一个满意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走啊,走啊,来到了昆仑山下的一间林子里,一棵500年的核桃树下,正准备上吊,碰到一位白发垂须的老人,老人正吃力地推一辆陷进水渠里的毛驴车。老人对他说:“年轻人!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一下?”年轻人想,推车子再死也不迟。等到推完车子,天已经快黑了,老人一定要感谢他,留他吃饭,他推掉不掉,心想,吃完饭再死也不迟。就这样,老人不断地请他帮忙,植林带、修水渠、种葡萄,一件又一件,年轻人没有理由推辞,只好干下去。秋天的时候,老人对年轻人说:“你不是一直要死吗?对不起,为我的事耽误了你这么久。现在,你可以去死了。”年轻人看着美丽的田园、林带、葡萄架,满篮粮食的谷仓,充满了绿草的水渠两岸,还有新盖的房子、百花盛开的花圃……这一切,全都和自己的汗水有关,让他割舍不得。他决定不死了,和老人好好活下去。他画画,做生意,总结和思考人生的意义,准备写一部哲学著作,就叫做《福乐智慧》。

据说,这个年轻人现在还活在世上。阿拉提·阿斯木与这位年轻人同在。《福乐智慧》中说,人的一生,最需要的是正义、幸运、智慧、知足。阿斯木用他的作品印证了智慧的火花。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多年的积淀,产生了一批批成熟的作家、诗人,他们用母语或用汉语创作,写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作品。阿斯木的小说是其其中的代表作。我认为,对这部作品的研讨和关注还将继续。



主编第一视野

阿拉提·阿斯木的诗意新疆

□叶梅